

行的。

实现书写快捷的另一种方法是对汉字形体进行简化。简化是由古文字向今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变化。《说文》中的小篆,就是在大篆的基础上“或颇省改”的结果,其中的“省形”、“省声”,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例证。隶书是汉字形体简化幅度最大的阶段之一,它对小篆进行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“以趋约易”,从而满足“官狱职务繁”的社会需求。从书写的角度来说,汉字的形体越简单,书写速度就越快;从理据的角度来说,汉字的形体越复杂,理据保留程度就越高。所以,书写和理据对形体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。汉字的发展就是要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,去寻求简繁适度的造型。我们既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任意破坏理据,也不能因为固守那些已经十分隐晦的理据而无视汉字的繁难。汉字的简化和汉字的理据,同样都是汉字性质和功用的必然要求。

简化汉字推行了半个世纪,方便了亿万人的认字和写字,加快了我国教育普及和成人扫盲的步伐,已经成为传播现代信息和国际交流的载体,在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,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。书写和认读简化汉字已经成为国内外绝大多数汉字使用者的习惯,因此,关于恢复繁体字的提法是不现实的。就我国目前的用字规范来说,繁体字的使用只能限于某些特殊领域,在社会通用范围内(教材、公文、新闻等)不使用繁体字。

---

作者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

最近一段时间,社会上对简化汉字议论得较多,我们应阐述己见。我们的态度是:汉字简化不能走回头路。

### 文字产生时就有繁、简之别

繁化和简化是一对矛盾,任何时候都会存在。

文字起源于古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觉“象”,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说文字的产生是黄帝的史官仓颉“见鸟兽蹄迹之迹,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,初造书契”。“书契”即文字,鸟足兽蹄的印迹,内在的“分理”纹路,都是“象”。甚至更早,上溯至《史记·封禅书》引《管子·封禅》佚篇谈到远古最早的帝王之一伏羲氏,他治理天下都是靠观“象”,“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视鸟兽之文,与地之宜”,制成八卦,“以垂宪象”,文中的“法”、“文”(纹)、“宜”,也无一不是“象”;如果说据“象”制成的八卦也是一种文字初阶,并无大碍,而汉字的深层积淀是“象”。常识告诉我们,任何时候任何人,对“象”的描摹都是可繁可简的。清代的《说文》学第

# 汉字简化不能走回头路

李 开

一大家段玉裁则说得更明白，“象”就是文字：“古人之象，即仓颉古文是也。象形、象事、象声，无非象也，故曰‘古人之象’。”用段氏的话来推论，每个“象”，也就是每个字，都可以有繁、简二式。说造字之初即有繁、简之对待，完全合乎情理，合乎人类认知。可见，繁化和简化都内化在先民造字的“具象思维”过程中。

裘锡圭先生说汉字是表音兼表意文字。表意有象，摹象成字时容易繁简并存。象形字、指事字和会意字，黄侃说“指事亦所以象形”，这三种造字法都是“其中有象”的，例如日、月之象，上、下指示地平线的上面和下面，合“止”、“戈”（皆象形字）为“武”字，合“人”、“言”（皆象形字）为“信”字。形声字的形旁表意义范畴，意象也很明确。“江”、“河”二字中的“水”表意义范畴，《说文》作形旁用的540部首不少是象形字，几乎每个部首字都能说出“其中有象”。例如第465号部首字篆文“弦”，本身就是形声字，很难说出其中的“象”了，但许慎说它“象丝轸之形”，段玉裁说它“象古文丝而系于轸。

轸者，系弦之处”，显然是从“形声多兼会意”去说其“象”的，甲骨文中的“弦”字，在象形的弓弦处加一指事符号，表弓弦所在。第474号部首字“风”字，徐灏笺说它“无形可象”，但据许慎的说法，“虫”字象形是它的形旁，“凡”字象形是它的声旁，且甲骨文中多借凤鸟象形字作“风”字，“风”字之“象”甚多。第490号偏旁字“金”似乎与“今”有关，也看不出它有象，徐灏笺说它“无可取象”，但许慎说它“象金在土中形”，林义光《文源》说它的古文（篆文）“象金在地中形”。“金”字最早见于金文，《效父簋》写作两平行的粗墨横，是个很典型的摹象简笔字。

形声字声旁“象声”，声亦“象”。索绪尔曾说语言的声响是“心理印记”、“心理性质理念”的“音响形象”。事实上，段玉裁《六书音韵表》据谐声偏旁归纳出的《古十七部谐声表》收录1521个“某声”声首字。据黄德宽教授的研究，古汉字基本声符仅501个，且逐步累进而成，殷商183个，西周新增157个，春秋战国又新增161个。声符的来历，也是从象形字、声同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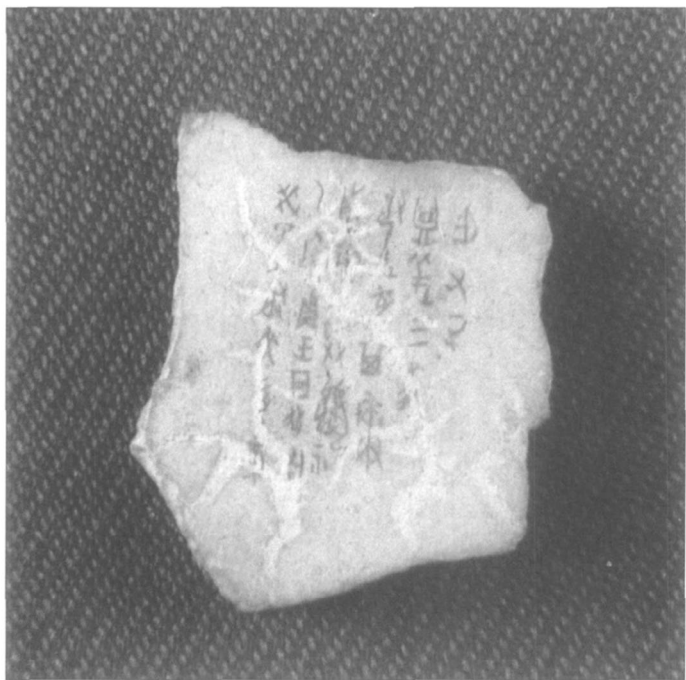
近的假借字发展而来的。无论是段说还是黄说的声符，绝大部分都可说出它所代表的“象”是什么，更何况如索绪尔所说，语言声音本身就是一种“音响形象”，形声字的谐声偏旁是一种“声象”，摹写“声象”虽不如摹写外物“形象”那么直观，那么容易，但也是可以做得到的，甲骨文中形声字已占60%，就是明证。又德国的洪堡特研究了汉字后说，象形文字，包括汉字系统中，“具体字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，只不过这种联系始终是概念的而不是语音的”，又说，汉民族具有“想象的知性”，“汉民族和汉语的知性倾向超过了对语音交替的爱好，因此，汉字这种字符在更大程度上成了概念的标志而不是语音的标志”。既然用“康德—洪堡特”式的“知性”，甚至是“想象的知性”来看待汉字，一个个的形声字当然也只能是“知性—感性”形象，形声字声旁都有“象”；某个方块字“始终是概念”，当然至少是“意象”，并不缺乏“形象”，凡“象”皆可繁、简并用描摹之。以上说明，繁、简之别内化于汉字造字之法本身，内化于形声造字法本身。

古文字、古文献中简化字比比皆是

要研究简化字，先得给它下个定义：“繁

体、简体只是相对比较而言，在同一个文字系统内一个字有几个形体时，笔画少的是该系统内的简体字。”如果是现代汉字，还须加上一句话：“简化字须经国家统一颁布后施行。”用这一“笔画多少”来看待甲骨文，甲骨文的简化字不在少数。例如：“屯”字，甲骨文共3字，其中后上一五·一二为简化字。“恒”字，甲骨文有2字，后上九·一 是简化字。“中”字，甲骨文有3字，甲三九八是简化字，与今“中”字极似，也就是说甲骨文“中”字简化字一直传用到今天，足见简化字的魅力。有一段时间，楷书“中”字写作近似甲骨文中的“中”字繁体，后来不用了。

甲骨卜辞中用简化字是常见现象。例如在周原发现的周文王时的卜甲，共20个字，用了简化字的有：拜字 / 在甲金文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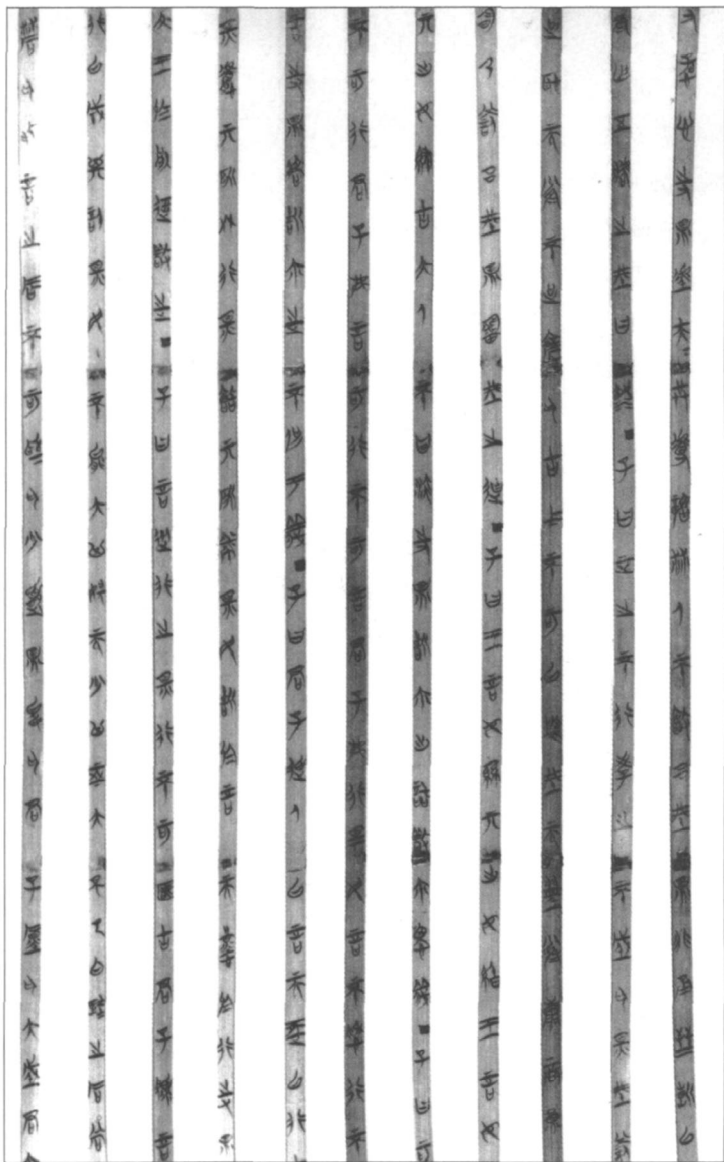
岐山县周原凤雏建筑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

统内看,此处笔画最少;侑字/此处作“又”字,通假,但笔画少,也可视为简化字;大字/读太,大、太古今字,古字“大”笔画少,也可视为简化字;甲字/此处用字同后上三·六,笔画少,简化字;斯字/此处作囟字,皆心部字,通假,笔画少,可

视为简化字,又此处所作的囟字,较甲五七笔画似少,简化字;正字/此处用字近同甲三九四,笔画最少,简化字;受字/甲骨文编著录三个“受”字,此处笔画少,简化字;有字/此处用字同粹一三,简化字;佑字/此处用了个重文符号同上文“有”字,而“有”字用简化字,此处也可视为作者欲用简化字。著名的《周原卜甲》,20个字用了9个简化字。金文文字大大增加了,简化字也增加了,总的来说,青铜器铭文辞用简化字的几率也提高了。

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、思想解放的时代,文字使用也比较随意,简化字盛行。据笔者研究《郭

店楚墓竹简·缙衣》47支简,共有1029字,用“笔画少”的简化字有166个,占16.1%。《上海博物馆楚竹书一册·缙衣》24支简,共977字,用“笔画少”的简化字有175个,占17.9%。两楚竹书用简化字比例都高,是汉字在其发展中尚未定型,多半以



《郭店楚墓竹简·缙衣》局部

偏旁代整字(古今字)所致,两相比较,后者用简化字比例更高些,故可推知沪简《缙衣》不比郭店简《缙衣》迟,差不多同时期,有可能会早些。这里得到的结论与学界的说法近同。可见历史上汉字简化字还会携带若干可供比较研究的学术信息。

进入封建社会后,用字讲究,如唐代,科举考试既设有“明经科”,还设有“明字科”,“进士考试,理宜必遵正体”,用字规范涉及个人命运,就不得不讲究了。唐代颜元孙《干禄字书》就是为社会提供应用文字范本的。此书后由元孙侄子大书法家颜真卿写录,刻于石,传播很广。颜氏叔侄提倡用字规范化,要求尽可能用正字,正字后来发展成正楷,一般都是繁体字;允许公众用通字,通字是通行已久,大部分是隶省、隶变,或改易偏旁的字;限制用俗体,俗字一般都是简化字。

奇怪的是,有些正字是简化字而非繁体字,例如:“回”正、“猿”正、“凰”正、“睹”正、“岳”正,等等。有些通用字也是简化字,例:“等”通、“走”通、“粮”通、“聪”通、“丛”通、“筒”通、“兹”通、“采”通,等等。

宋元以来民间俗体字即简化字用得很多。1930年,刘复、李家瑞著录的《宋元以来俗字谱》出版,共收12种民间刻本中用的简化字6240个,竟然是新中国成立后《简化字总表》中简化字总数的2.8倍。数量如此之巨,使用如此之广,以致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十六“经文字体”条,曾说及明代科举考试不得不分两场,“第一场令暗写‘四书’一千字,经书一千字,

脱误本文,及字不遵式者,贴出除名”,第二场再“考其文义”,还重申,汉代要“试书九千字以上,乃得为史(吏)”。官方禁止用俗字、简化字,可是,有人研究了明代天启、崇祯两朝427件“兵科抄出”档案,恰恰从这官方文书中找到了415个简化字,有的简化字出现频率还很高,如“据”字出现304次,“挡”字205次,“实”字279次,“边”字295次,许多简化字与我们今天的法定简化字形体相同,如:宝、体、灯、犹、迁、窃、战、几、机、尔、县、恋、会、党。

以上说明,历史上尽管封建统治者轻视简化字,扼杀简化字,但它还是破土而出,有的挤进了正体字行列,有的出现在官方文书中。

##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汉字简化到现代语文改革中的汉字简化

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,汉字简化与扫除文盲、普及教育一起蓬勃发展起来。最早提出汉字简化的是教育家陆费逵,1909年他在《教育杂志》创刊号上发表《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》的论文,认为采用俗体字对识字、写字、刻字都有利。1921年又发表题为《整理汉字的意见》的论文(《国语学刊》1卷1期),提出了整理汉字,制定俗体字的具体办法。五四运动后,钱玄同、黎锦熙等人对汉字简化作出了新的贡献。1934年钱玄同曾向“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”提出《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》(刊于《国语周刊》第123期),提案通过后,他又主持编订了《简体字谱》

(草案),收字2400多个。1936年哈佛燕京学社还出版了容庚的《简体字典》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汉字简化与推广普通话、用汉语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,成为现代语文改革的主要内容,改革的目标是语言文字规范化。从1950年教育部编制《常用简体字登记表》、1951年拟出《第一批简体字表》(收字555个)算起,汉字简化已快60年了,如从新中国成立前算起,我国的汉字简化正好经历百年。百年来文字工作者们艰辛备尝,百年来成果丰硕。今天看,以汉字简化为核心的汉字规范化的最主要成果可以说是五张表。

一是《简化字总表》(1986年新版)。该表收录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《汉字简化方案》中的全部简化字。总表又分三张表,第一表收350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;第二表收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;第三表收了用第二表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1753个。

二是《现代汉语常用字表》(1988年1月发布),共收常用字2500字和次常用字1000字。该表综合了自1928年陈鹤琴《语体文应用字汇》(4261字),至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教学研究所1985年研制的《汉字频率表》(4574字),共15项科研成果研制而成。

三是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》(1988年3月公布),共收通用字7000字。该表取用的语料范围从1928年至1986年。综合吸收相关科研成果20项研制而成。

四是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(1955

年12月发布,1986年调整后重新发布)。共收796组1027个异体字。

五是《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表》(1985年12月发布)。

汉字简化后最直接的效果,苏培成教授指出:“《简化字总表》收繁体字2261个,笔画总数是36236笔,平均每字16笔;收简化字2235个,笔画总数是23025笔,平均每字10.3笔。两相对照,平均每字减少6笔,占38%。”好处是:节省了书写时间,还大大增加了清晰度,便于认读和书写,还便于信息处理。从1951年国家公布简化字表以来,简化字深入人心,深受欢迎。

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海外繁体字印刷品的大量涌入,一些人开始热衷于用繁体字,出现了繁简并存的混乱局面,对此,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5月重申原有规定:“翻印和整理出版古籍,可以使用繁体字;姓氏用字可以使用被淘汰的异体字。除上述情况及某些特殊需要者外,其他方面应当严格遵循文字规范,不能随便使用被简化了的繁体字和被淘汰的异体字,也不能使用不规范的简化字。”这个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。我们认为这是解决目前滥用繁体字问题的正确方针和办法。

现在,又有先生主张取消简化字,一律改用繁体字,据上述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、百年来的努力和成就、公布和使用简化字近60年的收效看,可乎?

---

作者单位:南京大学文学院